



帝国史译丛 齐世荣 主编

拜占廷帝国

Byzantinische Geschichte (324~1453)

[南斯拉夫]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 著

陈志强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 mssmmsm •

拜占廷帝国

Byzantinische Geschichte(324~1453)

原书名：拜占廷国家史

[南斯拉夫]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 著

陈志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拜占廷帝国 / (南) 奥斯特洛格斯基著；陈志强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帝国史译丛)

书名原文：Byzantinische Geschichte

ISBN 7-225-02781-6

I. 拜… II. ①奥… ②陈… III. 拜占廷帝国
(324 ~ 1453 - 历史) IV. 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0924 号

版权登记号：(青新) 27-2005-003

原书名：Byzantinische Geschichte (324-1453)

作者：Geory Ostroyorsky

原出版者：Verlag C. H. Beck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1996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德国 Verlag C. H. Beck 授权青海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
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拜占廷帝国

[南] 乔治·奥斯特洛格斯基 著

陈志强 译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 行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680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 000

书 号 ISBN 7-225-02781-6/K · 18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帝国史译丛》编委会

主 编：齐世荣

编委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向 荣(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 坚(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帝国史译丛》总序

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请一些专家，翻译出版《帝国史译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出现过并至今存在着一些帝国，它们大都统治广大的地区和人口，具有称霸的野心和力量，并由一个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但“皇帝”之外，帝国最高统治者还有“元首”、“哈里发”等其他称号，甚至有些共和国因其霸权地位也自居或被人们称做帝国。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就公开叫嚣前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而美国自己也在正反两种意义上也被人称做“美利坚帝国”、“自由帝国”、“新罗马帝国”等等。帝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体，不论我们对它们采取何种态度，都有研究的必要，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可供今天的治国者参考和借鉴。由于认识上的分歧，要想给“帝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帝国”作为称号的国家实际上有各种类型，如以时代划分，则古代的奴隶制帝国、封建帝国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帝国有很大的区别，而某些衰落的封建帝国已失去昔日的力量和光辉，徒有虚名，实际上已沦为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本序言的有限篇幅内，不可能对这些既大而又复杂的问题进行讨论，只能就帝国的最一般特征略加讨论而已。帝国都是通过一连串的战争和兼并而建立起来的庞大国家，其中包括母国和众多被征服、被奴役的民族。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征服者对被征服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征服以后又对被征服者实行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剥削。罗马帝国在每次战争胜利后，都把俘虏的士兵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变卖为奴隶。罗马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力图在最短时间内从奴隶身上榨取尽量多的利润。罗马法明确指出“奴隶不是人”，“是另一种牲畜”。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动辄“屠城”。成吉思汗对他的将领说：“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战胜和杀尽敌人，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乘其骏马，纳其妻妾”。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后，屠城7日之久，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葡萄牙人在建立东方帝国的过程中，于1510年攻占果阿，处死了城内所有的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西班牙征服秘鲁、墨西哥后，开办银矿，征发印第安人从事奴隶般的采矿劳动，印第安人成批地死去。据估计，整个拉丁美洲在1500年有土著人口4000万，到1650年就只剩下1200万人了。印第安人的成堆白骨换来了大量金银流向西班牙。1500~1650年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帝国的白银多达16000吨，黄金180吨。西方殖民者在16~19世纪的大西洋奴



隶贸易中，给非洲大陆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1666~1776年英国奴隶商向英、法、西三国殖民地输入了300万奴隶，另有25万人死于海运途中。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2]

但是，在一些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战争除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外，还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亚历山大远征给东方各国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但客观上也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得以接触、交流和融会，是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蒙古的征服运动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生产，杀戮了无数人民。但征服的后果也促进了东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蒙古帝国建立后，东西交通畅通无阻，各地商人、使臣、僧侣、旅行家来往十分频繁。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进而传入欧洲的。西方各地人士东来，也把拜占廷、阿拉伯文明带到东方。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后，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但也开始了重建工作。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

一些大帝国在其存在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卓有建树，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例如，罗马在司法方面建立了严密的体系，对私人（不包括奴隶）权益的保障有详细、明确的规定，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因而能为后世资产阶级所利用，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处处以罗马法为蓝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科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拿破仑帝国曾经称霸欧洲，拿破仑所进行的一些著名战役虽然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范例，但他最引以自豪的还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在法国第一次将涉及人身自由、财产权、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规则整理为成文的法律，尤其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4]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定相关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不列颠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大英帝国给人类历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英国是“议会之母”，自13世纪创立后又经过不断的改革，终于成为各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圭臬。英国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引起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



革。英国还是“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5]

历史上也有一些大帝国，没有任何积极建树，只起了毁灭人类文明的消极作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德军占领区残酷剥削当地人民，榨取了至少1040亿马克（约合260亿美元）的贡金，掠夺的各国文物珍宝还不在以上计算内。第三帝国还在占领区实行奴隶劳动制度。到1944年9月底，强迫运往德国的外国劳工已达750万人，另有700万劳工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的战时经济从事生产。大批劳工因缺衣缺食和超强度的劳动而死亡。最残酷的是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政策，约6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希特勒对德国人民也不放过，1945年3月他下达“焦土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交通设备以及一切储备统统毁掉。他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都是劣等货，优秀的人已经战死，因此没有必要给德意志民族留下一个维持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罪恶的第三帝国原来自命是“千年帝国”，但只存在了12年就被埋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家被迫交出了殖民地。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实力大大削弱，已降为二等国家，面临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虽欲保持原有的庞大殖民帝国已不可能，荷兰、比利时更不用说。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老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转化。新殖民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经济手段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与活动，美、英、法等国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国家。新殖民主义与老殖民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与手段上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帝国”这种历史现象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新殖民主义作为“新帝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加以研究。

以上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了一些大帝国在历史上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最后，再谈一谈帝国的兴起与衰亡问题。任何大帝国的兴起，都有一个过程。它最初只是一个小镇，甚至只是一个部落，首先实现了内部的统一，然后以此为基础向外发展、扩张。以阿拉伯帝国为例，穆罕默德在迁到麦地那后，建立了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穆斯林公社，在公社内部不分氏族部落，皆以兄弟相待并互相援助，禁止互相仇杀。成吉思汗首先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为蒙古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葡萄牙、西班牙在欧洲最早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继之而起的荷兰也是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然后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18世纪英、法的崛起，仍然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恩格斯指出，欧洲在中世纪晚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之一，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这种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就是“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起来的基础。^[6]帝国兴起的时候，统治者朝气蓬勃，励精图治，并富有创新精神，故能开疆拓土，极一时之盛。有为的继承人也都能做到兢兢业业，守成不坠，更有为者则能在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



展。

各大帝国衰亡的原因不一，但也有若干共同之处，这里只谈两点。

(一) 穷兵黩武，逞强称霸。

大帝国统治者的野心总是不会满足的。他们在征服了广大地区以后，还要继续扩张，称霸全球。但是占领的地盘越大，战线就会拉得越长，军费开支就会越来越大，以致兵力分散，财力枯竭。而且，压迫越大，反抗越强。例如，西班牙帝国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从 15 世纪末延续到 16 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战争；16 世纪上半叶与德国新教诸侯的战争；16 世纪下半叶与英国的海战；同时又出兵干涉法国国内的宗教战争。整个 16 世纪，西班牙还与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冲突。17 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又卷入 30 年战争而不能自拔。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耗尽了国家的财力，流尽了国民的鲜血，西班牙帝国就在这些战争中走向衰落。又如，拿破仑在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以后，还不满足，在 1812 年率大军远征俄国。他狂妄地估计，在 3 周之内可以速战速决，迫使俄国投降，但不料攻下莫斯科后，竟是一座空城。俄国拒绝议和。于是，拿破仑大军纪律涣散，又因战线太长得不到后勤供应，不得不狼狈逃回巴黎，大帝国从此开始瓦解。1941 年希特勒进攻前苏联前，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无敌，也是骄狂到了极点。他认为苏联不堪一击，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以结束战争。但结果恰恰相反，莫斯科会战中，德国陆军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德国的闪电战破产了。德国一旦面临持久的东西两线作战，最终战败就不可避免了。日本以一个小小的岛国，强盛后野心恶性膨胀，竟把战线从中国大陆一直拉到太平洋上，焉能不败。总之，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帝国，不管它曾经多么强大，要想征服全世界，是绝对办不到的，是必然要灭亡的。我国古代兵书上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在今天仍是至理名言。

(二) 统治阶级骄奢淫佚，日趋腐败。

大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征服地区横征暴敛，搜括了大量财富，供其享乐。骄奢淫佚的生活使他们日益腐败堕落下去。罗马帝国的尼禄（公元 54~68 年在位）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他不问政事，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和宴庆游赏之中。公元 64 年夏，罗马发生大火，大火之后，罗马留下一片废墟，尼禄竟抢先修建奢华的“金宫”。尼禄挥霍无度，很快使国库枯竭。面临财政危机，他增加苛捐杂税，并杀死一些元老贵族，没收他们的财产。尼禄的暴政造成民怨沸腾，众叛亲离，近卫军也不再听命于他，终于自杀。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统治者，或荒淫无道，或庸懦无能，再也没有屋大维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了。香料、奴隶贸易和在东方、美洲的殖民地给葡萄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起了很坏的腐蚀作用。劳动受到鄙视，好逸恶劳成为时尚。一向游手好闲的贵族拥向宫廷，捐一个闲差，便能领取丰厚的年俸。16 世纪三四十代，庞大的冗官冗员已使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奢靡之风盛行，购买外国货成为时尚，富



人消费的服装、家具、艺术品、香水等全是进口货。早在 16 世纪就有葡萄牙人指出，东方的香料和珠宝不是拯救而是毁灭了葡萄牙。拿破仑是一世之雄，以革命起家，但在称帝以后，便大搞家天下，封其兄弟为王，并娶奥皇之女为皇后。拿破仑拜倒在正统主义面前，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越来越丧失人心，腐蚀了国家的政治基础，这是拿破仑帝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以往大帝国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美国。美国是一个“帝国”吗？它能永远称霸吗？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帝国”通常被作为贬义词。但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是“新帝国”、“自由帝国”、“新罗马帝国”种种说法骤然热闹起来，而且被当作褒义词使用。美国明明是一个共和国，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又把它称作帝国呢？美国究竟是共和国，还是帝国呢？我认为，今天的美国无帝国之名，而有帝国之实。美国是一种新型的、有自己特点的帝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杜鲁门就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后来在 40 多年时间里美苏争霸，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一直未能得逞。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认为独霸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1992 年 1 月，老布什总统声称：“美国已从西方的领袖变成世界的领袖”。1993 年克林顿也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本是一个悲剧，但小布什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变本加厉地推行霸权主义。在 2002 年 9 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公开宣称“不允许任何一个敌对军事强国崛起”，“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像在冷战时代一样挑战美国的力量”。2002 年 6 月，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可谓霸道到了极点。

美国作为一个“新帝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假借自由、民主的名义，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解除对方的思想武装；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通过经济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种种经济侵略，其中跨国公司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机构；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殖民地，但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它们实际上是美国的军事殖民地，等等。在上述手段之外，美国也和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发动战争，如对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帝国行为，其蛮横霸道的程度，打击范围的广阔，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大帝国。

美利坚帝国能像它的辩护士所宣传的那样永久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有一种规律是新老帝国都无法违反的，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强。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第三帝国都因穷兵黩武、逞强称霸一一覆灭了。今天美利坚帝国妄图做世界霸主，到处树敌，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俄罗斯学者杰拉金指出：“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惨剧完成了从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苏联后世界的形成过程。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人类已从两个国



家的对抗转向本质上的另一种对抗——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和所有其他人的对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上离美国越远的社会，这种对抗就越尖锐。”^[7]美国学者约翰逊说：“像20世纪的其他帝国一样，美国选择了不是审慎地生活于和平和繁荣中，而是成为一个与愤怒、抵制的世界相违反的大规模军事帝国”，“我们发动的事业将把我们引向新版的猪湾惨败和最新的提速的越南战争情形的重演。”^[8]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一个国家站在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不论它自居什么样的帝国，现在还有多么大的力量，难道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不走向衰落吗？

齐世荣

2005年12月

【注释】

- [1] 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屋大维采用“元首”（princeps civitatis）的称号，意为罗马第一公民。直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才正式称“君主”（dominus）。阿拉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称“哈里发”（阿拉伯语继承人一词的音译）。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766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61页。
- [7] 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 [8] [美]查默斯·约翰逊著，任晓等译：《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译者前言

奥斯特洛格斯基的《拜占廷国家史》完成于上世纪 40 年代初。随着岁月的流逝，该书的重要价值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被列入拜占廷学经典图书。奥斯特洛格斯基夫人为本书希腊文本所写的前言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这里就不必赘言。目前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为世界主要语言，中文译本的准备工作也至少进行了 10 年。为了最终确定本书的翻译，我们广泛征求了国际拜占廷学同行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这里，我们愿意对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拜占廷史教授拉伊奥（Angeliki Laiou）、顿巴登橡树园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塔尔伯特·阿里斯-马丽（Talbot Alice-Mary）、哈佛大学历史系拜占廷史教授塞维森科（Ihor Sevcenko）和麦克考米科（Michael McCormick）、前国际拜占廷学会秘书长卡拉杨诺布鲁斯（I. Karrayanopoulos）和伊格诺米基斯（N. Oikonomides）和现任秘书长赫里索斯（Evangelos Chrysos）、牛津大学凯伯学院院长卡麦隆（Averil Camero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斯科特（Roger Scott）等表示衷心谢意，这些当今国际拜占廷学重量级学者的宝贵建议促使我们最后下决心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多方面的帮助。我国世界史学科资深学者齐世荣教授作为本书所属的这套丛书的主编，在确定该书的翻译工作中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哈全安教授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有关伊斯兰教的专业术语问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张绪山教授翻译了《拜占廷国家史》希腊文本的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齐宏亮副编审积极协调解决了本书的版权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郑玮和李秀玲协助译者解决了全书的注释和插图以及索引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徐家玲教授也对翻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们的帮助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谢。

该书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本书中文译本主要根据英文本译出，个别地方参考了德文和希腊文本。正文部分以 1952 年胡塞（J. Hussey）的英文本为基础，注释则采用 1999 年鲁特格尔大学出版社再版的 1969 年英文版本。

关于书名的变动还应说上几句。一般而言，书名是不宜变动的，本书将《拜占廷国家史》改为《拜占廷帝国》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是本书所属的《帝国史译丛》统一规格的需要。我们实在不忍心因名称而放弃这部同行公认的最佳著作。其二是作者本人从未刻意强调其书名的特殊意义，而他写作的内



容和关注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拜占廷帝国，无论从时空的角度看，还是从内容所反映的实质看，拜占廷帝国是本书的核心。另外，中文版的人名和地名索引也做了简化，君主、学者、作品和货币等的英文名称则在文内夹注，供研究者参考。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就这些变动向中文读者表示歉意，恳请他们在开始阅读以前注意这一点。

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中文译本一定存在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保持原作的面貌。



奥斯特洛格斯基的生平事业^[1]（代前言）

法努拉·帕帕祖鲁

这部著作的希腊文译本在它的作者、我亲爱的伴侣奥斯特洛格斯基逝世一年半后问世了。我相信，这个版本会使他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希腊语和希腊民众对他来说是熟悉和亲切的。这不仅因为拜占廷研究是他的专业，而且还因为我个人与这一切所具有的关系。我之所以被出版人对本书表现出的兴趣所深深打动，在我并非拜占廷学者的情况下，接受他的邀请为本书写一点介绍性文字，原因在此。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评价一下奥斯特洛格斯基的学术观点及其研究成果的价值。这部著作在作者健在的时候，就受到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特别推崇。历史自然会对它作出最终评价，将来的几代人将会在更大的空间中，看到它在拜占廷研究中所发挥的真实作用。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作者生平事业的几个阶段，使不了解这位学者的陌生读者对他的事业有所了解。我追随他的事业已近三十年，也就是说，开始于他新作迭出、赞誉如潮、声名大振之时。^[2]面对他获得的巨大成就，多次有人问我，他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部完美且完整的著作，这一事实应归于他性格和思想中的那些明显特征？他从来不匆忙行事，也从来不说“我无闲暇”之类的话，而诸如此类的话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咒语。

我认为，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虽然奥斯特洛格斯基多次遭受命运的捉弄，但他的事业是极为顺遂的，学术生涯中没有出现过动摇反复，迷失彷徨，变化不定，而充满令人欣慰的成功。奥斯特洛格斯基 1902 年出生于俄国的彼得堡，他的家庭环境充满对俄国文化价值的追求。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青年时代是伴随着俄国文学度过的，可以肯定，如果他留在俄国，他必定会成为俄国文学史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其他俄国文学巨匠一直与他相伴，直到生命的终点，这些人的著作无时无刻不激起他的赞叹，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灵中激起欢娱和灵感的涟漪。他终其一生都热爱着他的祖国。他为其祖国而感到骄傲，为光荣的彼得堡、列宁格勒感到自豪，同样，他也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感到骄傲。

由于命运的安排，奥斯特洛格斯基在 17 岁时与他的家人一起离开了俄国，1921 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哲学学院的一名学生。当时的海德堡是重要的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在这里，他追随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阿尔弗



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路德维格·库齐乌斯 (Ludwig Curtius) 以及其他名师学习。起初他学习哲学，醉心于雅斯贝尔斯的课程，然而，他后来在寻求一个可以使他获得工作的“实用”专业时，转向了社会学和经济学。那时他有幸旁听了还是年轻的政治经济学讲师的埃德加·萨林 (Edgar Salin) 的课程，埃德加·萨林学养宏富，对历史研究独具慧眼，翻译并注释过柏拉图的著作，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也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罕见魅力的导师。他与萨林商讨之后，选择了一个萨林本人兴趣之外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13]实际上，这个论文题目确定了奥斯特洛格斯基此后追求的学术方向。他开始研究难度很大、当时还无人涉及的拜占廷税收文献，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完成了《10世纪拜占廷帝国农民纳税团体》。^[14]这一研究使他步入历史学和拜占廷研究的领域。由于博士论文的完成，他再次完全肯定了他的拜占廷研究方向。此后他动身去了巴黎，在那里师从著名的查尔斯·迪尔 (Charles Diel) 和加布里埃尔·米勒 (Gabriel Millet) 学习了两年六个月。不久他出版了第二部著作《拜占廷圣像破坏运动研究》^[15]。由于博士论文奠定的基础，他完成了大量的有关拜占廷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税收问题的研究——这个主题基本上来自他业已形成的有关拜占廷史的基本观点。^[16]对圣像破坏运动的研究是他申请讲师资格的论文。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奥斯特洛格斯基转向了对其他重要时期的拜占廷史、拜占廷文明的宗教根源、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些主题如同农耕史一样成为他喜欢研究的内容。^[17]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编年纪、历史编纂学和政治史的研究成果，^[18]展示了他对所有历史主题的异常广泛的兴趣。

奥斯特洛格斯基在德国著名大学的学习经历，在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拜占廷研究中心的居留研修，以及他在德国开始的辉煌研究和执教事业，无疑对他的学者生涯有着重要影响。我无法设想，如果他留在德国，会是怎样的事业前程。但我认为，他离开德国实际上是幸运的——1933年他接受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工作——因为德国的恶劣事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这样说，不仅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在南斯拉夫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贝尔格莱德创建了拜占廷研究学派和一个研究中心，而且主要基于新的环境（巴尔干地区同时也是斯拉夫的环境）对他的人格和著作的影响。在这里，他置身于古老的拜占廷的领土。这片土地在中世纪与拜占廷密切相关，并且仍然存留着这种密切关系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遗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经历了获得解放和社会复兴的美好时光。南斯拉夫人民已经接纳他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他与南斯拉夫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接受了新的社会观念的影响。至少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众多痕迹。

奥斯特洛格斯基在33岁时——此时他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任拜占廷学教授——接受慕尼黑《考古学指南》编辑瓦尔特·奥托 (Walter Otto)



的请求，为这套著名的丛书写一本拜占廷史，以便填补很久以来他已感受到的一个空白。^[19]这个建议并非出于逢迎，而是对他当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学术界获得的声望的承认，同时，对这位年轻学者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必须具有年轻人的勇气，才能接受建议，写出一部通常应在盛年时期完成、也是终生事业的代表性综合著作。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接受这个建议，完全是因为他对整个拜占廷史已经形成了具体的见解。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两年后（1937年）完成了著作的初稿。这部著作出版发行时（1940年），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兴趣，被一致认为是奠基性著作（grundlegendes werk）。^[20]观点的新颖，特别是资料的安排，对拜占廷国家发展史的观察方法——他以这种方法考察了拜占廷国家几个历史阶段上内部政治（经济、社会、行政、军事、教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外部政治的相互影响——受到特别的重视。他在资料使用上的准确性，介绍外国学者观点时所达到的客观性，叙述上的紧凑，文辞上的简约和优雅，都受到赞誉。

在1952年第二版、1963年第三版中，作者得暇对此书进行了仔细修改。他参考众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观点，对全书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完善和补充。他个人的研究使他注意到这些学者的成果。他对专家们对书中涉及的主题表达的不同看法作出了评论，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另一些观点在讨论后则没有接受。在战后的岁月中，他完成了研究拜占廷封建制度的重要著作，提出并精炼了他的观点，^[21]还完成了关于军区制（thema）、^[22]拜占廷城市、^[23]拜占廷—斯拉夫关系的研究著作。^[24]所有这些成果都在他的这本著作的新版本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挥和阐述。但是，正如他在德文第三版前言中所说，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的念头经常萦绕在他的心头。然而，这样的修改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然他准备出版一个新版本，但他本人无法改变著作的基本构造。如果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是在55岁而不是35岁完成《拜占廷国家史》，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个问题，试图得到答案是徒劳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对于每一位拜占廷学研究者，这部著作已经成为必备的参考书，“标准性的著作”（standardwerk）和“枕边书”（livre de chevet）。^[25]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成功，大致是与拜占廷研究的巨大发展是同时的。中世纪史中的这个被遗弃的、在一定形式上难以理解的学问分支，只是在本世纪下半叶，才在历史学科中找到它的位置。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拜占廷国家史》展示了拜占廷帝国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揭示了拜占廷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说明了它在南部斯拉夫各族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地影响了当今世界对拜占廷帝国的认识，在广泛的程度上，在各阶层的人们中，扩大了对拜占廷“现象”的兴趣。这一点在南斯拉夫境内尤为明显，他活跃在这片土地上近50年之久。他作为教授、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以及研究所出版物的顾问，^[26]加强了拜占廷史研究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中世纪技术史



研究之间的联系，打开了国际思想交流的宽敞的大门，在国际学术界组织了塞尔维亚史的编纂。

奥斯特洛格斯基对材料的掌握、领悟能力，思想的敏锐，在整体事物中对本质事物的判断力，是他每一项成功的学术研究的基础素养。他所具备的这些先决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同代人所不具有的，但是，我认为，尽管如此，仅以这些条件还不能解释奥斯特洛格斯基著作的质量，也不能解释其研究范围，更不能解释其统一性。他作为学者的人格特点，还表现在更客观的学术研究中。奥斯特洛格斯基的著作展现出的独具一格的特点，是稳健、有条不紊、冷静而从容的批判力，节制适度而避免言过其实，从来不乏雅致（urbanitas）——这是他的著作的特点，也是日常生活的特征。他从不匆忙行事。对于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每一件事，他处理起来都稳健扎实，有板有眼。对他来说，写作是件十分耗费心力的事情，虽然他能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曾说过，写作而不经受巨大痛苦，是办不到的，因为任何人要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阐明一个结论，就像发现一个结论一样，都是特别重要的。他的写作方式独树一帜——他创作出这种表达方式以便表达更为准确、更为优美——通信方式比政府公文更为简洁。这种风格，就如同他的学术著作所明显展现的一切，任何人都会注意到。

人们要以他那样的方式工作和生活并像他那样取得成功，实际上还需要一种与其说后天养成，倒不如说与生俱来的罕见天赋，这就是凡事只抓大端，忽略琐屑，对其他事不加干涉的才能。他只阅读具有无可怀疑价值的书籍。他从研讨会和旅行中带回来的，只有重要的信息和建立起来的重要联系，这种联系使他获得新的知识。遭受失败，行事愚蠢，蒙受侮辱，行为鲁莽，道听途说——这些经常困扰我们头脑的东西——都与他无缘。他不喜欢谈起不愉快的事物，他可能从不在脑海中保留不愉快的事物。同时，他又心平气和地忍受某些使他面临很多问题的困难和不幸的局面。他以这种方式保存了很多精力！他把这些精力全部用到了构成其生活内容的学术方面。他身后既没有未完成的研究，也没有未实现的计划，这种情况决非偶然。如果不是疾病终止了他的工作，他肯定会完成更多的拜占廷研究方面的著述，但他从未说过他有过壮志未酬的规划，也从未为时光流逝而焦虑过。他一生善始而善终，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他的一生是幸福的。

贝尔格莱德 1978年5月

(张绪山译)



【注释】

- [1] 作者法努拉·帕帕祖鲁(Φανούλα Παπάζουρη)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妻子。本文是她为本书的希腊文译本所写的序言。原文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中文由希腊文译出(译者注)。
- [2] 他获得的荣誉很多。1946年当选塞尔维亚科学技术院非常院士,1948年当选院士;1954年他当选哥廷根科学院院士;1956年获得 Gustave Schlumberger 奖;1957年当选伦敦皇家史学会非常会员;1961年当选比利时科学院院士;1962年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63年当选不列颠科学院院士;1964年当选美国中世纪史学会会员;1967年当选巴勒莫科学院通讯院士;1966年当选西德科学院院士;1968年被斯特拉斯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69年当选波士顿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1970年当选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在南斯拉夫获得最高学术成就奖——AVNOJ 奖;1971年当选维也纳科学院院士;1974年当选雅典科学院外籍院士;1975年当选巴勒莫科学院荣誉院士。从1961年他一直担任国际拜占廷研究会的主席。
- [3]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对他的这位老师怀有热烈而持久的忠诚和感激之情。见他的文章 Edgar Salin und die Anfänge eines Byzantinisten, *Edgar Salin zum 70 Geburstag*, Tübingen 1962.
- [4] Die ländliche Steuergemeind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m X. Jahrhundert,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and XX, Heft 1/2 1927 (Amsterdam 1969 年影印,附有作者的补充)。
- [5]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Bilderstreites,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Heft 5, Breslau 1929 (Amsterdam 1964 年影印)。
- [6] 这些文章以 Privreda i drušvo u Vizantijskom Carstvu(拜占廷帝国的经济与社会)为题结集于 *Sabranij dela Georgija Ostrogorsky*(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全集)第2卷。《全集》于1969年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于贝尔格莱德出版。收入其中的还有他的博士论文及修改的拜占廷文献译文。
- [7] 见 *Sabranij de la Georgija Ostrogorsky* 第5卷,标题为 *O verovanjima i shvatanjima Vizantinaca* (拜占廷的信仰与观念)。
- [8] 我们只提一下这些著作:Die Chronologie des Theophanes im 7. und 8. Jahrhundert, *Byzantinisch - 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 7 (1930), 1 - 56, 以及论文 Avtokrator i samodržac, *Glas Srpske akademije* (塞尔维亚科学院集刊)164 (1935), 95 - 187。
- [9] 瓦尔特·奥托本人在《拜占廷国家史》德文第一版前言中提到这一点。
- [10] 如恩斯特·科乃曼(Ernst Kornemann)给作者写信,“对这本为未来拜占廷研究奠基的著作的完成和出版”,表示祝贺(1940年9月12日)。Franz Dölger“对这部使您声名大振的真正的奠基之作的完成”表示祝贺(1940年9月12日)。还有许多赞誉出自著名期刊发表的介绍性和评论性文章,如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W. Ensslin),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 Spuler),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F. Dölg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O. Schissel), *Analecta Bolandiana* (F. Halkin)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请允许我引述拜占廷研究家 Henri Grégoire 发表在 *Byzantion* 16(1942/1943)上的介绍性文发表的文章。请允许我引述拜占廷研究家 Henri Grégoire 发表在 *Byzantion* 16(1942/1943)上的介绍性文字(546):“我们终于得到了一本名副其实的拜占廷研究指南,实在是太幸运